

中外语言与文化论丛

总主编/王启龙 田 兵

中西融通与文学互鉴：

曾朴、曾虚白父子
与“真美善作家群”研究

王西强◎著



科学出版社

中外语言与文化论丛

总主编/王启龙 田 兵

中西融通与文学互鉴：

曾朴、曾虚白父子
与“真美善作家群”研究

王西强◎著

科学出版社

北 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系统梳理、认真分析了“真美善”书店出版物和《真美善》杂志全刊,对曾朴、曾虚白父子及“真美善作家群”的文艺主张与译著实践进行了比照研究,使用大量历史资料论证了“真美善作家群”这一具有趋同性审美追求的文学团体作为一个文学史存在的学术合理性,并充分呈现了“真美善作家群”参与当时文学变革的思路、方式、文化姿态以及他们在历史的“当时”和文学史的“当下”的遭际,从文学变革的角度审视了1930年前后的文学在政治与商业的张力中试图整合本土与外来文学资源,以择取新路、谋求发展的文学史价值和意义。

本书为相关专业研究者参考用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西融通与文学互鉴:曾朴、曾虚白父子与“真美善作家群”研究 / 王西强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5.12

(中外语言与文化论丛 / 王启龙, 田兵主编)

ISBN 978-7-03-046932-8

I. ①中… II. ①王… III. ①曾朴(1872~1935)-文学研究②曾虚白-文学研究 IV. ①I2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313716 号

责任编辑: 阎 莉 王洪秀 / 责任校对: 赵桂芬

责任印制: 张 倩 / 封面设计: 铭轩堂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三河市骏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5年12月第 一 版 开本: 720×1000 1/16

2015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1 1/2

字数: 226 000

定价: 7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中外语言与文化论丛

编委会

总主编 王启龙 田 兵

编 委 (按姓氏拼音排序)

阿不都·热西提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院长

蔡维天 台湾清华大学语言学研究所教授

陈 明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陈国华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外语教学与研究》副主编

陈学然 香港城市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教授

封宗信 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教授

岗村宏章 日本岛根大学亚太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河元洙 韩国成均馆大学教授

贺 阳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

黄南松 美国南加州大学教授

李雪涛 北京外国语大学全球史研究院院长、教授

彭青龙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七届学科评议组成员, 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教授

束定芳 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 《外国语》主编

田 兵 陕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教授

王 宁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欧洲科学院院士, 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教授

王宏印 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王启龙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陕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教授

张 韧 陕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张建华 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教授

我们常说，中华民族文化是 56 个民族多元一体共同繁荣和发展的结果。同样，人类历史告诉我们，人类文明或者说世界文明是全人类艰苦卓绝的长期努力奋斗所获得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在这个过程中，从古至今没有哪一个民族文化可以独放异彩，独立发展。人类文化的发展，都必须有赖于文化之间的交流。尤其是在全球化的今天更是如此。对此，季羨林等诸位先生说：“讲文化交流，就必须承认，文化不是哪一个民族、哪一个国家或哪一个地区单独创造和发展的。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国家不论大小，民族存在不论久暂，都或多或少、或前或后对人类文化宝库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人类文化发展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是全世界已经不存在的和现在仍然存在的民族和国家共同努力的结果，而文化交流则在其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①

简而言之，是文化交流促进了人类文化的发展，从而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而在文化交流中，语言这个媒介自然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那就是为什么，古今中外，凡是要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尤其是异族文化的时候，最直接、最重要的手段就是学习这个民族的语言，从语言入手了解这个民族的文化。而在东西方高等教育体系中，各著名高校或研究机构一般都设有学习外国语言文化的系所。国外的东方学学术机构有的历史悠久，闻名世界，比如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牛津大学东方学学部（Faculty of Orient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Oxford）、剑桥大学东方系（Faculty of Asian and Middle Easter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mbridge）、不列颠图书馆东方手稿与图书部（Department of Oriental Manuscripts and Printed Books, The British Library）、法国巴黎大学的高等中国研究所（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 Université de Paris）、法国国立现代东方语言学校（École Nationa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Vivantes）、法国国家语言东方文化研究院（Institut National des Langues et Civilisations Orientales）、

^① 季羨林，周一良，庞朴，1990. 放眼宇宙识文化，读书（8）。

法兰西远东学院 (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德国的东方学会 (Deutsche Morgenlaendische Gesellschaft)、德国东方研究所 (Institut für Deutsche Ostarbeit)、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 (Institute of Oriental Manuscripts,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德国汉堡的亚洲研究所 (Institut für Asienkunde, Hamburg)、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 Harvard University), 以及其他许多著名大学的东亚系, 等等。值得注意的是, 他们的共同特点在于, 语言是第一关注的要素, 首先学习并掌握好语言之后再说别的。而欲学好语言, 需要学习和了解的内容很多, 而不仅仅是文学。从众多的西方国家高校和科研机构设立的东方研究机构、非洲研究机构、亚洲研究机构、国别研究机构的名称就可以看出, 除了某种语言之外, 它们关注的内容很多, 凡是这个语言所承载的一切文明或文化内容都是学习和研究的对象。

当然, 在国内也有许多著名的外国语言文学教育或研究机构, 但是, 如果我们仔细思量, 其实这中间是有所不同的。在国内, 我们通常是外国语言文学, 除了“语言”就是“文学”, 换个角度说, 学习外国语言仿佛就是为了研究外国文学, 别无其他。长期以来都是如此, 这或许是受当年苏联学科分类的影响, 抑或是我们本有的习惯或传统。不管是哪一种, 我个人认为, 我们都该在这一点上向西方学习, 借鉴其经验对我们现有的外语系 (学院、大学) 的办学理念和办学机制进行调整, 这大概不失为一条值得探讨和摸索之路。

在这方面, 陕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也在努力探索。我们这次编辑出版《中外语言与文化论丛》, 就是一种尝试。根据丛书名称, 大概读者就可以了解到我们对这套丛书的期许和期待。我们不希望它只是一套外国语言文学的丛书, 我们希望它以外国语言文学为坚实基础, 旁及其他学科, 并在中外比较中、在不同视角中、在学科交叉中去从事学术研究, 或者说换个视角研究问题, 换个视角审视世界, 换个视角反思自己, 这样的话, 或许我们会在某些问题上或多或少有真正的创获。钱钟书先生说: “有了门, 我们可以出去; 有了窗, 我们可以不必出去。”^①这句经典本是先生以文学的笔调描写门和窗以感悟人生哲理的, 但是, 如果放在我们此时此刻讨论的语境里, 其实是会给我们带来另一番无尽而有趣的启示的。

在这套丛书里, 我们不追求完美的体系, 不追求精致的形式, 我们希望每位作者能在自己的论题方面, 在新材料、新观点、新方法或新领域的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有

① 钱钟书. 1990. 写在人生边上,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所拓展即可；我们希望每位读者在坚实的研究基础支撑下，通过缜密的分析和研究，能够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达到一定高度的学术水平。

我们这套丛书最大的特点应该是其开放性。首先，我们在学科上是开放的，我们当然以外国语言文学为主，但我们不囿于这个范围，中外语言、文学、艺术、宗教、历史、文化等，凡是与外国语言有渊源的，与中外学术文化有关系的，或者利用外语从事学术研究的高水平成果，都可纳入，借此可以在中外比较中、在学科交叉中、在观点碰撞中，紧扣时代需要，探索和拓展新领域、发现和研究新问题，为国家社会经济文化建设服务；其次，我们在作者群方面是开放的，入选丛书的作者并非一定要是专家教授或著名学者，凡是有真知灼见、自成一体，并具有一定学术功力的著述，不管作者是谁，我们都会酌情收入，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人才培养、学术研究、学科建设方面另辟蹊径；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在学术观点上是开放的，绝不会因为所谓的学术门派、学术观点的不同而把具有真知灼见的学术研究成果排斥在外，因为真理的探索和发现往往都是在不同的学术观点相互碰撞和激荡中产生的。

学术文化研究与交流中的开放性当然蕴含着包容性，只有包容对方才可能有开放的胸怀。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特质之一就是开放和包容。《周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正是开放与包容的中国传统宇宙观之写照。中国古人认为天地最大，天高行健，地厚载物，寓意进取开放，厚德包容。正因为中国传统宇宙观的开放与包容，历经数千年发展历史的多民族汇聚中华民族文化才会多元丰富、深邃弥久。

开放就要进取向上、就要志存高远，包容就要虚心学习、就要厚德包容。在民族文化传播、发展与交流中，开放与包容相辅相成，“唯因文化的包容性，开放在实践操作上才成为可能；唯因文化的开放性，包容才获得了实质性意义。人类文化的发展如果没有开放和包容的品质，就不能保持长久的生机和旺盛的活力”。“从中国历史发展看，各种外来文化的进入并没有使中国传统文化丧失其固有的本色，相反却丰富了中国的传统文化。”^①而在学术文化研究与交流中，中西方的互动何尝不是如此？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高度发达，带动全方位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如何把握世界大势和国际潮流，积极主动地加强中外文化交流和民族文化的国际传播，积极主动地融入世界文化发展的主流之中，并在世界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真正成为文化大国？只有成为文化大国，才可能成为世界强国。

① 邹广文. 2013. 中国文化的厚德、开放与包容，人民论坛·学术前沿（1）。

习近平主席指出，在民族文化对外传播、交流，在对外宣传方面，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引导人们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①要完成这一伟大使命，我们必须坚持开放与包容，一方面，昂扬向上、积极进取，努力向全世界传播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另一方面，要厚德包容，虚心学习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优秀文化，吐故纳新，不断丰富中华民族文化。我们期许这套丛书，能够在这方面发挥些许作用，在中外语言文化研究与交流方面做出一定贡献。在学习和借鉴西方先进学术成果和科学理论的同时，能够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②

若能如此，我想这套丛书的使命就算达到了，任务就算完成了。谨此为序。

王启龙

2015年12月

于西安

① 习近平. 2014. 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外文局.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北京：外文出版社：155.

② 同上，156.

研究视野的拓展与学术空间的发现

在当下的近现代中国文学学科及其相关的中外文学交流史等学术研究领域之中，关于曾朴、曾虚白父子的文学活动及其文学史评判，似乎从来就不是一个学术史及研究者们所关注的热门话题。其中的主要原因，我想除了当代学科划分造成的作家身份的无所适从或定位含混等之外，当代学术的政治意识形态化及其权威理论方法下的主流文学史叙述，对于曾朴、曾虚白父子与“真美善作家群”文学理念及其翻译、创作等文学史实的遮蔽与压抑，或者是一种漠然状或边缘化的简单批评及历史解读，也就必然地成为一种学术思想及其研究方法上的常态。

因此，这部《中西融通与文学互鉴：曾朴、曾虚白父子与“真美善作家群”研究》，虽然由于某些个人的考虑及写作上的因素，许多问题的论述及理论阐释的展开，诸如围绕其创作形态方面的探讨等，都还有待作者进一步的思考及研究的深入。然而，这本书应当予以肯定和最为重要的，就是其中所体现出的多元开放的文学史意识与立足于中西文学融通互鉴的学术立场，以及对于相关研究资料具体细致的搜集整理及其关系的理论发现等方法上的自觉。因此，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本书不仅拓展了近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学术视野及其历史阐释的叙述空间，同时也为曾朴、曾虚白父子文学实践等学术领域的专题研究等，做出了事实上的努力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于是，我们所看到的，就是本书作者不同于常见的及一般历史境遇下的文学史追寻及其研究叙述，而是以曾朴、曾虚白父子及其“父传子承”的文学活动，以及他们“真美善”文学理想的实践历史的考察。本书包括作者对曾氏父子法国文学及其浪漫主义艺术理念的理解，及其上海“法国文艺沙龙”及其文化氛围的经营，以及《真美善》杂志的创办及其作家群的形成等文学现象的探索，解读并论述中国文学从 19 世纪末前后所开始的“向西方学习”走向，以及在这种“中西融通与文学互鉴”潮流之中，现代中国文学发生发展的多元复杂机制及诸多被历史消解或人为忽略不记的重要事实与社会因素。

通过本书，我们能够了解到的“曾朴、曾虚白父子及‘真美善作家群’”文学史实的发生，以及其文学自我建构与艺术扩张的背后，除了作家个人成长的社会政治、历史背景与审美趣味的经验或感悟等自身原因之外，对于来自法国 19 世纪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三种主流艺术理念“真”、“美”、“善”的美学理解，进而相应追求的“真实感人”、“形式完美”和“革新进步”等文学理想。同时，我们还可了解 19 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文化机制及其出版接受等方面的演进变革。本书不仅揭示出曾朴、曾虚白父子美学思想及其“父传子承”文学活动的独特性历史特征，引起一般读者对于近现代中国文学及其熟知的中西文学影响交流史的“常识性”与“多元化”的反思，而且丰富了近现代中国文学及其研究领域的研究理路，开拓了文学史认知与写作的多种可能及研究空间。对于刚刚走上学术之路的青年学者来说，其论述与文字之中所表现及达到的专业意识与史识观念，实属不易，应当予以申明鼓励。

在这里，我还要说明的就是本书在研究选题及理论方法等方面所表现出的诸多特点，实际上也和作者的专业背景及知识结构有着直接的关系。王西强副教授原来是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大学毕业留校执教后，主要从事的是外语教学及中外文学翻译方面的工作与研究。工作三年之后，在职攻读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硕士、博士研究生。近些年来，他先后主持有多项中外文学译介影响及接受传播方面的国家及教育部社科基金课题，同时也在现当代中外文学交流影响研究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及影响。这种跨学科的知识背景及研究生学习阶段的个人努力，让他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中西文学关系的复杂性及丰富性，有了更切实地专业层面基本了解和知识上的一定准备。因此，作为他的导师，除了真切地了解作者研究这个课题的过程及所付出的艰辛外，也为他由此展示出青年学人的锐气与学术态度的踏实等，感到由衷的高兴。并且，在此也乐于向读者说明及推荐这样的学术成果。

自然，关于近现代中国文学及中外文学交流影响的学术研究，包括多元文学机制背景下，对诸如曾朴、曾虚白父子文学活动等作家群体或文学社团在内的个案性专题研究，在拓展并启发我们超越惯性的思想方式或研究模式，发现或质疑僵滞的文学史叙事及其问题症候等理论方法现状的同时，事实上也对作者及其相关课题研究的学术理路与理论深化，提出了进一步的期待与更高的要求。其中，仅本书涉及的研究内容与提出的具体问题，例如关于 19 世纪法国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与曾朴、曾虚白“父传子承”文学思想的关系，以及其和五四新文学浪漫主义文学运动之间的文学史分析；曾朴、曾虚白父子文学创作及翻译的文本分析，以及其在中国近现代文学翻译史上的

历史地位及美学评价等，不仅可能为本课题及作者以后的研究，开启新的学术思路及扎实的论说空间，而且能够让读者更为完整、全面地把握了解近现代中国文学及中外文学交流影响的多元化机制与发生的复杂性。当然，这也将会让作者的学术之路及创新境界，走的更为踏实，更加清晰和开阔。

王 荣

2015 年 11 月

于长安南山北苑

1927年，曾朴、曾虚白父子在上海创办“真美善”书店、《真美善》杂志，坚持近四年，出版、发表了大量文艺作品，团结了一批有趋同的文艺倾向和文学理想的作家、翻译家和（留）学生。他们通过在法租界的“异质”文化氛围中搞文艺沙龙聚会、相互往还，通过运作文化商业资本、编辑出版图书杂志，得以跻身上海现代都市公共文化空间，获得了在文学艺术层面的公共话语权。他们通过创作、翻译和文艺批评等方式，参与了中国文学现代化转型的理论探索与路径设计，形成了一个有趋同的审美气质和文学追求、有相对稳定的活动范围和组织方式、有较强的向心力的“真美善作家群”。

本书通过分析研究这个有着清醒的文学变革意识、有着文坛典型性和共性的作家群的文学活动和著译实绩，来反思他们参与文学变革的思路、方式、文化姿态，以及他们在历史的“当时”和文学史的“当下”的遭际，并从文学变革的角度来审视 20 世纪 30 年代的文学如何在政治与商业的张力中试图整合本土与外来文学资源，以择取新路、谋求发展的文学史价值和意义。本书的论述将通过以下几个章节展开。

第 1 章，引言。本章从中国晚清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关系研究这一学术视角，在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视野中，通过资料梳理和观点呈现来展现百余年来曾氏父子研究与“真美善作家群”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指出本书的基本研究方法与内容，说明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第 2 章，曾朴、曾虚白父子的文学理想与实践。本章通过梳理曾朴、曾虚白父子参与文学活动的相关文学史料，来勾勒他们在常熟地域文化及其家学系统的影响下，所展现出来的通过文学著译活动在文学上除旧布新、“匡时治国”的文化理想，以及他们开放包容、全面革新中国文学的文化姿态。

第 3 章，真美善书店及《真美善》杂志的创办及其文学活动。本章通过简要描述

20 世纪 30 年代上海文化生产场域的生存规则，呈现真美善书店及《真美善》杂志创立的历史文化条件，状述曾氏父子创办真美善书店及《真美善》杂志以“进修文艺”“广交文友”的文学活动，并通过数据统计呈现真美善书店及《真美善》杂志的出版实绩和刊物形态。在《真美善》杂志上，曾氏父子系统阐释了其“真”“美”“善”的文学理想与艺术标准，确定了“文学的范围”，为其“真美善”事业做出了形式规范与审美导向。

第 4 章，“真美善作家群”的形成及其文化姿态。本章论述“真美善作家群”的形成及聚集，展现其独特的“法国式沙龙”的文学生活方式和他们从“客厅”到“书店”由内而外的文化交往活动，描述了他们的群体性文化姿态：追求文学的“伟大”与“普及”，放弃启蒙姿态，推倒文学的“非文艺性”壁垒，通过报媒、杂志的引导，组建“文化的班底”，建设“群众的文学”。

第 5 章，凝聚交际：艺术的宣扬与商业化推销。本章论述“真美善作家群”通过一些常规和创新性栏目及策划某些文学活动，对外宣扬自己的文学理念，并进行颇具“文化表演”色彩的自我推销活动，这是曾氏父子针对 20 世纪 30 年代文学的生存规则和激烈竞争所进行的商业化推销。

第 6 章，“注重翻译事业”：外国文学的翻译与介绍。本章通过介绍曾朴、曾虚白父子及“真美善作家群”翻译外文学的成绩，来展示他们“容纳异性”与“系统翻译”的基本立场和方法，以及他们的翻译观念与技术探索对于现代翻译的意义。

最后一部分，结语。从文艺主张、文学理想、组织方式、与主流文坛的关系和最终命运等方面来看，真美善书店及《真美善》杂志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现代文坛上都是积极参与文学变革的典型代表，他们主动与新文学接近却又与新文学的新方向——革命文学主潮自觉疏离，这体现出他们独特的审美诉求和文学理想与现实文学需求的深刻矛盾。“真美善作家群”的文学实绩和文学史命运，为我们考察 20 世纪 30 年代的文学生态提供了一个颇为独特的典型性视角。

关于本书的论述在文字和格式上的规范问题，还有以下几点需要说明：

（1）作者的署名问题。在《真美善》原刊中，曾朴的文章有时署作“东亚病夫”，有时署作“病夫”；曾虚白的文章有时署作“曾虚白”，有时署作“虚白”，有时署作“白”，署名方式较为随意。在本书的论述文字中，使用曾朴、曾虚白全名，凡引用原文、原题以及原作者署名时，均依原书、原刊，不作改动或统一。

（2）标点符号规范问题。民国时期现代汉语标点符号还没有通用的规范，本书在引用民国书刊所载原文时，标点符号均依原文，不作改动。

(3) “的、地、得”问题。民国时文中“的、地、得”三字未有统一的使用规范，并多用“底”字，本书引文均依原文，无需也无法统一。

(4) 书、文题目和原作者译名问题。本书在论述中凡涉及译著及其作者的译名时，均依据译者当时的译法，未按照时下通行的译法统一；当时译者有两种译法的，也在引用或论及时尊重原始译法（同时标明其他译法或今译），如曾朴在发表于《真美善》杂志上致刘舞心的信中，始终使用“阿弗洛狄德”的字样来指代其与曾虚白合译、后来正式出版时题为“肉与死”的译作，本书作者在论及该书时，按照时间、场合的不同，区别使用，未作统一。又如，在《真美善》杂志上，《炼狱魂》的原作者前后署名“梅黎曼”和“梅丽曼”，译者相同，译法有变，本书在论述中引用时均遵照原文发表时的署名，并标明发表期次、时间，未作统一。其余此类问题若干，均依原文照录，不一一列出。

本书作者在引用原文时对原文、原书有认真的勘误和考校，以期在学术规范之内，呈现原文原作风貌，但因为本人知识水平、学术能力以及所见资料的局限，难免有错讹之处，请读到拙作纰漏的各位方家不吝赐教，惶恐拜谢。

王西强

2015年10月

Preface

In 1927, Zeng Pu and his son, Zeng Xubai, started their literary cause by opening the Truth, Beauty, and Goodness Publishing House and *Truth, Beauty, and Goodness Magazine*, which lasted for nearly 4 years. By publishing a lot of books and articles of literature and art, they united and attracted a group of writers, translators, and students who shared similar artistic ambition and literary tendency. The Zeng's hosted a literary salon as a means of welcoming and communicating with their comrades. Meanwhile, they got fame and celebrity in the public sphere of modern urban culture and discourse power of expressing their opinions on literature and art by operating commercial capital in the field of literary writing and editing. They made exploration in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sincerely proposed their designs and blueprints of literary reform. Their shared efforts, similar pursuit and aesthetic temperament helped them be recognized by their comrades and the literary circle and united them into a so-called Literary Group of Truth, Beauty, and Goodness.

This book, by analyzing and studying the literary activities and achievements in literary writing and translation of this group of writers who conceived a strong sense of literary reform and showed the characteristic and generality of the literary circle of the 1930s, reflects on the ways of thinking, means, cultural pose they deployed when participating in the reform of literature, and their experiences at their time and the way they are commented and related in the present written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ry reform, the book observes the way the 1930s' literature tried to compound Chinese and foreign literary resources in the tension of political interference and literary commercialization, and concludes the significance of it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The argumentation of the book goes as follows.

Chapter I is the introduction part, whi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iterature of late Qing Dynasty and modern literature in the academic view

of the history of the 20th-century Chinese literature, deals with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study on Zeng Pu, Zeng Xubai and the Literary Group of Truth, Beauty, and Goodness, the major problems the author of the book wants to solve and the means of argumentation applied.

Chapter II is entitled The Literary Ideal and Achievements of the Zeng's, which categorizes the historical literature and records of the Zeng's participation in literary activities, and outlines their open and tolerant cultural pos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culture of Changshu, their birthplace, and their family tradition, and their cultural ideal reflected in the process of realizing their cultural dream of "spreading the new while removing the old" and their political ambition of "save the country by eliminating the difficulties".

Chapter III presents the historic conditions and fact of the foundation of the Truth, Beauty, and Goodness Publishing House and *Truth, Beauty and Goodness Magazine*, and their literary activities. In this part, the author pictures the living principles of the 1930s' Shanghai cultural creation and presents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publishing house and magazine. On the latter, Zeng Pu and Zeng Xubai systematically defined "truth", "beauty" and "goodness" as his personally recognized literary ideal and artistic standard. Meanwhile, they set a stylistic scale of literature as the principle of literary form and the orientation of aesthetics.

Chapter IV deals with the formation the Literary Group of Truth, Beauty, and Goodness and their cultural pose, and shows their special means of life appreciating literature in a French style salon held in both Zeng Pu's sitting room and the publishing house, which was indeed a kind of inward-to-outward 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ir cultural poses were kind of pursuing "greatness" and "popularization", abandoning the standpoint of enlightenment, breaking the non-literal partitions, nurturing one's cultural audiences and establishing "the literature for the mass", with the help and conduction of the mass media such as papers and magazines.

Chapter V focuses on the publicity and commercial promotion of literature conducted by the Literary Group of Truth, Beauty, and Goodness. They designed some very creative columns, events and collective "cultural performance" to market their writing, opinions on literature and themselves as a literary group, which was a means

of struggle to survive in the fierce competition of commercialized literature in the 1930s.

Chapter VI is about their accomplishments in the field of translating and introducing foreign literature to China. Their theoretical opinions and technical trials on translation are significant to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translation, because they creatively proposed their basic position and two conceptions of “accommodating difference and exoticism” and “systematic translation”.

The last part, is the conclusion, which observ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ts literary assertion, ideal, ways of organization, relationship with the main stream of the literary circle and its destiny, and finds out that the member writers of the Literary Group of Truth, Beauty, and Goodness wer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active participants in the reform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they were in touch with but yet kept a proper distance from the new direction of the mainstream of “New Literature”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which reveals the deep gap and conflicts between their aesthetic ideal and the practical need for literature. The achievements and destiny of the Literary Group of Truth, Beauty, and Goodness provide us with a very unique perspective and insight into the literature of the 1930s.